

委员 笔记

在情同与共中前进

——奥运文化随想

王众一

奥林匹克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届奥运会——第32届夏季奥运会终于在东京主会场点燃了圣火。东京奥运会主题是“United by Emotion”（情同与共）和“Moving Forward”（前进），场馆的设计与开幕式的安排都紧扣这一主题，将若干条彼此关联的要素线索若隐若现地平行贯穿其中，将东亚传统智慧、日本的文化特质、全新的奥运理念等呈现出来。

开幕式上增设了向死者默哀的环节，森山未来以独舞形式进行了舞蹈表演。战后发展起来的舞蹈善于表现哀悯生命的主题，放在本次奥运会特殊增设的默哀环节倒是恰如其分。这和象征人类神经传导的红绳舞互为呼应，体现了疫情之下人类对被迫分离的焦灼及对恢复连接的渴望，体现了“United by Emotion”（情同与共）的主题。而在最后点燃圣火时安排医护人员传递火炬，又体现了不畏疫情迎接希望，契合了“Moving Forward”（前进）的主题。

开幕式上的视频中呈现了场馆地下一颗葵花种子，在会场里投影为一棵快速成长的幼苗，这寓意着2013年获得主办权之后就在孕育发芽的本届奥运会。幼苗在最后点燃圣火环节成长为孩子们手中的一束束葵花。在花束的拥簇下，奥运会历史上首次使用的燃烧时不会产生

二氧化碳的氢气燃料圣火被点燃。

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区重建与复兴的愿望融入“Moving Forward”（前进）主题得以呈现。升旗环节的执旗手中有来自福岛的人士；奥运圣火传递至日本时选择由福岛登陆；圣火在会场传递不仅特地安排了6位来自东日本地震灾区的少年儿童，甚至周围迎接圣火的少年儿童手中的花束也都来自地震灾区；最后，氢气圣火冉冉燃起，象征着地震后的复兴。

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中木质元素呈现了东方智慧。一群江户时代的木匠在木台上工作，敲打节奏带出现代青年的踢踏舞。木工们拉动着绳索，折叠着的木质奥运五环缓缓展开。五环用材来自上届东京奥运会的馈赠。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各国运动员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树种。57年间树种长大成材，其间伐材如今派上了用场。无独有偶，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设计者隈研吾的构思也瞄上了木质材料。这座由取自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木材建造的场馆，体现了以木材作为建筑材料的传统理念和低碳环保的特质，与2005年爱知世博会场馆建筑理念一脉相承，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建筑去混凝土化、亲和自然的后工业环保思维。场内场外，57年前的世界各国树种与今天来自47个都道府县的木

材，跨越时空汇聚一堂，呈现了东亚生生不息的传统智慧。临时决定空场办会，限研吾顿感禅机，又为空场座椅设计了错落有致的不同颜色，运用“色”平衡“空”，赋予“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以新解。

在江户时期，日本形成了诸多今日日本文化的特质，反映这种特质的要素被巧妙地运用于本届奥运会。木工头巾上、工作服上的蓝白格点，是江户时期日本平民服饰上常见的图案，也反映了日本文化中的共同体意识。以此为灵感，融入象征美好未来的扇面要素，设计出了象征东京奥运会两大主题的会徽。在孩子们的推动下，会场上的巨型积木摆成了会徽。随着串场的喜剧演员指引，巨大的会徽由1824架无人机在场馆上空组合而成，并幻化为水晶一般的蓝色地球。

本届奥运口号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外加上了“更团结”，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亮点。它使奥运精神得到发扬光大，体现了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进一步追求。各国运动员入场时空座席上打出的光色随着该国国旗的主要颜色变换，制造出虚幻的啦啦队效果，使无观众的会场里充满了浓浓的暖意。2021年的东京奥运直面全人类抗疫的主题，“更团结”成为不同于追求极限成绩的人类新目标。这既反映了当下日本国内重大的主题，又与全球

防灾防疫的共同关切密切呼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也有所契合。通过体育赛事及体育精神，克服偏见与歧视，尊重多样性发展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奥运会这一“人类的庆典”，追求平等、包容、团结、尊重等最大公约数，正体现了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追求，体现了对“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坚守。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人民中国杂志社总编辑）



华夏

有一种风范叫『讲究』

——琐忆白化文先生

马庆洲

7月6日傍晚时分，知悉白化文先生仙逝的消息，颇感意外。怅然之中，找出先生赠送的七八种签名本，重温先生的华章，昔日与先生交往的一些场景，又浮现眼前。在北大教授群中，白先生并不是声名特别显赫的那一类，但其为人为学却又个性鲜明，尤其是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范”，那就是格外在乎礼数，言谈举止都讲究一个老礼。如今，这种“讲究”已属稀缺，而随着白先生以及他这一代人的离去，再去领略这种“讲究”，恐怕就更难觅其人了。怀想之中，思绪难抑，把这份感受记录下来，作为对白先生的敬意与纪念吧。

记得中学时代，我就读过白先生编注的一本“古文选”之类的书，确切书名记不清了，但“白化文”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印在脑中。后来才知道这是白先生的笔名，行世后影响反超本名白乃桢，所以就借办身份证之机将笔名“转正”了。白先生有专文《我的笔名与姓名》，讲述自己的小名、大名、字及笔名的来历、含义等，文字轻松幽默，一派“白氏风格”。而我在中学毕业十几年后，终于有缘得识白先生本人，且还可以近距离地请益，这是当初未曾想过的事。

白先生是信息管理系（前身为图书馆学系）的老师，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能有机会亲近他，接受他的指导，完全是因为两位老师的关系。白先生与褚斌杰先生、费振刚师都颇为相契，友情甚笃，先秦两汉专业硕士、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等场合，少不了白先生这位“常委”。白先生慈眉善目，语出诙谐，总能给严肃的答辩会带来一丝轻松的气氛。我们这些后生的文章，难免粗疏浅薄，但白先生一贯秉宽厚之心，以鼓励为主，从不吝溢美之词。所以，只要白先生当评委，我们的心里就踏实许多。白先生在《追忆褚斌杰学长二三事》中就说：“这十几年，蒙褚伯大学长不弃，遇事总是想着我。即以博士生答辩而言，他和费振刚师的学生答辩，差不多都传我参加。每次都以胜利通过结束。其实，我是答辩委员中最不负责的，对于论文，自嘲‘学习孙权’，‘观其大略’。”“不负责”，自然是白先生的谦辞，对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他从不姑息，常常三言两语，便能直指要害所在。记得我自己的毕业论文，为了凑字数，将一些本该舍弃的资料也塞到文中，白先生明察秋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食而不化”的做法，令我汗颜不已。但对我在搜集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白先生也给予充分肯定，称许我在文献方面的训练，还吩咐我单独拷贝一份论文所附资料给他。白先生的指导，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文献意义的理解，论文修订出版时，我对材料加重审查，删掉了那些可有可无的部分。

白先生自幼便与北大有缘，在沙滩时，家就住在离红楼不过百米远的胡同里，经常出入北大，耳闻目睹过很多稀罕事；1950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时，老北大的学者大多都还在校教书，如罗常培、俞平伯、唐兰、章廷谦、魏建功等先生的课，他都赶上了。有此独特而丰富的经历，白先生对北大乃至老北京的人和事可谓见多识广，满腹都是掌故。白先生在《熏陶——从沙滩到未名湖》一文中，就讲到这段心迹：“从沙滩到未名湖，留下了我近50年的足迹，留下了我从青年到老年的绝大部分足迹。留下了我求学、恋爱、工作、建立家庭直到退休的足迹。现在，我仍怀着对往事极为留恋的感情，绕着未名湖锻炼遛弯儿。”

在学术上，白先生涉猎面较广，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尤其是在敦煌学及佛学方面，成果丰硕。在白先生身上，最让我难忘的，能让我不时回味的，是他言谈举止中的那些“礼数”，那种古风。他的这些礼数，在某些追风者眼中，或无殊除旧之感。但以我而言，在白先生本人，讲究这些礼数，是他自幼熏陶出的一种修养，是已经内化了的无意识。如果再讲得宏大些，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的传承与体现。

白先生的这种“礼数”，最直接的的一个表现是在称呼用语上。在这一方面，以我有限的观察，从未见白先生逾矩。对自己的老师一辈，他总以“老师”相称，不得不涉及名字时，必称呼老不道名；用到第三人称，也一律用老北京话中的“您”。在较为正式场合，如2010年的“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等，白先生发言时只要提到老师名讳，都要起座起身，以示敬意，如是者再三。我感觉，白先生这样做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习惯，而绝非如仪的形式。就称呼问题，我曾当面请教过白先生：现在的老师们已不再有“字”，如果送老师书如何称呼才合适。白先生解释说，如今已无“字”，只写姓即可，虽然有些大姓易重复，但老师本人是明白的，只是以后不好考证。我见过白先生夫妇二人联名送给林庚先生的《行历抄校注》一书，写的就是“林老师叱正”，遵循的大概就是这样原则。

对平辈，尤其是北大中文系出身的，不管是同班，还是高几级或晚几级，白先生都言必称“学长”。我注意到，无论是会议发言，还是形诸文字，白先生经常提到的几位，如褚斌

杰（50级）、傅璇琮（51级）、程毅中（51级）、袁行霈（53级）等先生，一律尊称为“大学长”。如果要统计一下白先生文章里的高频词，“学长”应该算一个。

对晚辈，白先生的“礼数”也从不稍减。在第二人称上，不管对方多么年轻，总是用“您”，这也算是一种老北京范儿吧。我在校中几次遇到过白先生，只要见到了，几米开外，白先生就会哈一哈腰，大声说：“今天见到您很高兴！”同时早早伸出手，热情地握一握。

毕业以后，我与白先生还有过几次较为密切的接触，更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2010年1月9日，“《观澜阁丛书》首发品鉴会”在北大图书馆举行。下午会间休息时，我提前问候白先生，并呈上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淮南子考论》一书。见书，白先生开口便说：“搞我们这一行的，早就知道此书出版啦，就是找你也找不到。”此书是2009年7月出版的，我原打算等有机会面呈各位答辩老师以显诚意，故此没有及时寄送。白先生的话令我颇感意外，也有几分感动，毕业都八九年了，白先生还记得这篇不像样子的论文，怎不令人心生涟漪？此次趋谒，我还特意带着先生所著《负笈北京大学》一书，想请先生签名。看到书，白先生说“这是你自己买的，不是我送的”，落笔时特意斟酌一番，写了“借花献佛”四字。我知道，这也是典型的白先生风格，只能“笑纳”这几个字。第二天，“林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午餐后，我先送费振刚师到畅春园，再送白先生回紫霄园。路上，我向白先生请教了几个他文章中提及但又未充分展开讲的北大旧事，他娓娓道来，让我大饱耳福。到家时，白师母李鼎霞老师早已准备好《闲谈写对联》《楹联对话》等书，白先生签名后赠我。我深知，这赠书也有白先生对我微劳的犒赏之意在焉，他不想在人情上留下亏欠。

2013年2月，白先生托人转告，希望得到一套由我责编的《唐代四大类书》。闻此，我迅疾与白先生联系，在电话中白先生表示“话出口又后悔了，这书部头大，很贵”。我告诉白先生，我有富余的样书，不会作难，而且这书能入老师法眼，说明有用，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肯定。如此一番解释，才打消了白先生的顾虑。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上午我驱车来到白先生府上，送上《唐代四大类书》及几种目录学方面的书。而白先生也早已将《楚辞补注》《佛教造像手印》《汉化佛教与佛寺》等几种著作签好名、盖好章，作为回礼赠送给我。大概也是因为岁末了，白先生舍得放下手头笔耕的活，和我多聊了会儿家常。以往我对白先生的感知，仅限于书斋里的一面，对我这些生活琐事的关心，让我感受到了白先生另外的一面，感受到了他的通达与古道热肠。宋人“开明练达，遇事如破竹”一言，庶可用于此时的白先生身上。

壬辰除夕那次见面后，似乎再未见过白先生。想白先生年事已高，上门求稿者又多，我没敢再打扰，只是偶尔从费振刚师那里获知一点他的消息。今年春天，费师也遽归道山，眼见老成凋零，能不生今昔之慨乎？而更令人怅惘和深思的是，今日燕园之中值得后来者不断品味的学人与风景，尚有几许？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

名家 名笔

描着红字的碑记

吴克敬

那天的雨，下得出奇得大。伫立在您毫不起眼的墓碑前，我心潮澎湃。与其他共赴井冈山参观学习的人不同的是，我还藏着一层别样的情愫：20多年前，我曾有幸见过您，还扶着您的手臂一起上台阶。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您回到延安，应该有80岁了。记忆中，您朴素、瘦小、和善，不怎么爱说话，很安静，也很慈祥，除了气质很好之外，一眼望去，和邻家普通的老太太大没两样。大家对您毕恭毕敬，崇拜有加，以眼神、语气、神情告诉我，您不同寻常……时日匆匆去，一切一晃而过。虽然我见过您，其实根本不懂您。直到我雨中来到您的墓碑前，才恍然发觉，此刻迅猛的雨幕，可能正是上天的提醒，要我们后来者：勿忘历史，勿忘前辈。

更或许，是给多元化时代的下一代，一场灵魂的洗礼。

作家朋友文中述说的您，是早年在井冈山参加红军的曾志老人家。此时此刻，我如我的这位朋友一样，就恭立在墓碑前，怀想着老人家不平凡的一生。对了，这次再来井冈山，我是受《小说选刊》的邀约来的。在此半个日子前，我们在一处小楼的接待室里，听取曾志老人家的孙儿石金龙关于她的一些前事的报告。而我的这位作家朋友，仿佛如晓似的，在手机上推来了她的这篇文稿。我一边耳听石金龙的报告，一边阅读作家朋友的文章，以为为她的笔墨，对石金龙报告是一种十分恰切的补充，因此我在写作时，把她文章里说出的这一段话，照录在了我作品的前头。

数十年的文学写作生涯中，这是我唯一这么做起来的一次。

作家朋友文章里记述的事情，我数年前来井冈山时，就在小井村曾志老人家的墓碑前，满怀深情地聆听过一次。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的我，如这次一般恭恭敬敬站立在那棵桂花树下，一次次地鞠躬……当时我是这么想了，作为老革命的曾志，她死后可以有一个至为尊贵的安葬，但她遗言下来，把她死后的部分骨灰拿回她革命过，并时刻怀想心间的井冈山小井村，安放在这片土地上……

她老人家给自己的安排，清晰

而明了，要求她的子女孙娃，把遗体先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火化后的部分骨灰，就埋在井冈山下的一棵树下，做那棵树的肥料。

儿女孙娃没有违背她的遗愿，并且虔诚地为她树立起一块不大的石碑，石碑上书“魂归井冈 红军老战士曾志”的字样，以及“1911.4—1998.6”的数字……就是她老人家的全部生平了。我以为这是不够的……我有一部60余万字的专著，写的全是我见识过、研究过的碑文，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由故宫出版社出版了精选版。这部名为《碑说》的作品，书写了百余通碑记，没有哪一通比曾志老人家的碑记更简约，它们动辄数百字，甚至上千字。此前我没有想过，只有面对了她老人家的碑记，我才想到，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还有精神遗产，其实并不以碑记字数的多少来评判，可能的结果是，字数少的碑记，反而比字数多的碑记，更能感动人、影响人。

肃立在老人家的碑前，我不仅注意到了碑记文字的简约，还注意到“红军老战士曾志”7个描红的大字，有点儿歪歪扭扭，显得十分青涩与笨拙。对此我有点糊涂起来了，为曾志老革命树碑，难道请不出一位专业的书法家人物吗？我内心的疑惑，很容易地表现在了我的脸上。陪伴采风团的人，有知晓其中原委的，凑到了我身边，给我仔细说了那7个描红大字的来源，原来是曾志老人家失散多年的长子描红来的。

曾志老人家失散在井冈山的儿子名叫石来发。作为长子，他有资格，代表家人来给他们的母亲和祖母书写墓碑。

字少情长！我心里不断翻腾着的是这样一个词儿，并坚定地认为，唯有这四个字的词儿，方能明晰那七字背后的眼泪，还有辛酸……我虽然无法知道石来发初为母亲书写墓碑的内心感受，但我看得清楚，那七个字肯定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一点点描画出来的呢！

文盲的石来发不会“写”，他只会“描”，也只能“描”，正是他的那一“描”，“描”出了他自己的天性，更“描”出了母亲曾志的品性。天性依然的石来发从没进过学

校的门。他被母亲散失在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中，天性地成长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做了一辈子“汗珠跌在地上摔八瓣儿”的老农民。但他真真切切，是曾志老人家的长子。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母亲曾志把他留给井冈山的乡亲们时，他还是个婴儿。他们母子分别的时间太久，到再见面时，他即已长成了个枪杆一样的小伙子。母子一场，母亲曾志是痛伤的，而他亦是不幸的。这样的痛伤与不幸，在他们母子重逢后，因为党组织的原则性，还因为曾志老人的自觉性，延续着。石来发依然固守乡村，做着他的农活，吃着他的农家饭，而没有随着母亲的身边，享受母亲可以给予他的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

母亲曾志去世了，石来发依照母亲的遗愿，把她安葬在这棵年年会开出一树香气的桂花树下。

长子石来发依循井冈山民间所有的习俗，来为母亲曾志树碑。他感念母亲的高风亮节，还有母亲的人格操守，没有请人给母亲书写墓碑，而是自己个儿，用他庄稼人粗糙的大手，第一次拿起毛笔，依照他写来的“红军老战士曾志”七个字，一笔一画，照样儿往母亲的墓碑上描了……石来发描得认真仔细，每描一笔，眼睛便要酸一下，酸着即会流下一滴泪来，石来发知道他把那些个字描红用了多少时间，但不知道他滴落了多少眼泪。

我看着曾志老人家墓碑上的字，想着石来发当初描红的情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如今，石来发也已作古去了，去到母亲的世界，与他们母子当初分别的地方，再也不会分离地团圆在了一起……青山翠竹，长河落日，他们母子永远地守在一块儿。

曾志老人家的坟墓，与她倾注了心血的红军医院相邻着。我先在红军医院的旧址上仔细地走了走，认真领略了她年轻时的事迹。“老红军战士”的曾志，当年即担任着这所红军医院的党支部书记。那时的她，仅仅只有17岁，还又身怀六甲。恰其时也，她深爱的第一任丈夫牺牲在了井冈山保卫战中，她是悲痛的，悲痛着咬牙带领她的战友们，从菲薄的军饷中，受命创建了这所红军医院，为红军的伤病员解除了伤痛，使他们再上战场继续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贡献力量。